

前 言

8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了讨论文化问题的热潮，这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在这场文化热潮中，《周易》文化尤其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这是值得高兴的。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其影响于后世既深且远。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易道博大精深，实乃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大根大本。

然而，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自废除科举以后，经学教育中断，传统优秀文化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新文化运动视传统文化为引进民主与科学的障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肆意予以抨击；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文化更在“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浪潮中，首当其冲；进入新时期以来，一些全盘西化论者鼓噪“黄色文明已经死了”，要代之以“蓝色文明”，将传统文化视为“落后”与“不合时宜”。其实，传统优秀文化非但不必然是现代化的障碍，更可以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助力，亚洲四小龙的崛

起，便是最鲜明的例证。环视全球，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全盘否定其传统文化为代价，而完成其现代化。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前途、没有生命活力的民族。面对现代化的严峻挑战，传统文化亟需理性批判，重新诠释和现代转换，而后方能重获新生力量。欲重振中华民族之自信、自尊和自强，欲有效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也必须对《周易》文化进行现代化转换。

可是，在近年的《周易》文化研究中，却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缺乏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实证精神，动辄把自己的主观臆测说成是破译了千古之谜，利用某些新闻媒体招摇撞骗；二是将《周易》与现代科学相比附，热衷于证明某种科学理论或技术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而没有探讨《周易》理论思维与科学精神的兴趣；三是将《周易》与占卜方术混淆起来，以算命术代替易学，或者把易学归结为算命术，严重歪曲了《周易》的人文精神。因此，我们感到还有对《周易》与现代文化进行讨论的必要。

适逢朱耀廷先生筹划向北京大学 100 周年盛典献礼丛书：《诸子百家与现代文化》，于是我与赵建功同志共同商量，希望他执笔写一本论述《周易》与现代文化问题的书。赵建功同志在我提出的总体框架和编写提纲的设想下，广泛考察了有关《周易》文化的资料，参阅了海内外有关的若干论著，对《周易》文化及其在现代文化中的渗透，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写成了六章。1997 年春节前后，他捎来了试写的部分章节，我对写作体例、文章风格以及应该注意的某些问题提出意见，供他参考。暑假期间，我又邀赵建功同志来京改稿，对全部初稿作了认真研究讨论。在此基础上，他又写了第二稿。最后由我略加修订，成为这样一本书。

《周易》文化，尤其是与现代化文化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问题 决非短时间所能解决 进行更深入地研究 展开充分讨论 是十分必要的。这本小册子远不能概括《周易》文化的全部 论述也不可能尽如人意 还望得到时贤和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郑万耕

1997 年 9 月 29 日

导 论

周易的现代反思

人类的智慧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终于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公元前 800 ~ 前 200）爆发出万道霞光之时，即德国哲学大师雅斯贝斯（K. Jaspers, 1883~1969）所谓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在中国这片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神圣土地上，出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放异彩、各领风骚的壮丽文化奇观，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①、博大精深、影响广远的坚实底蕴。作为《周易》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易传》就诞生在这一人类文明群芳争艳的伟大历史时期。而《周易》的另一组成部分即《易经》则在公元前 11 世纪左右的西周初期即已基本形成。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极为珍贵的文化典籍，它对于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举世惊羨的空前繁荣无疑起了不可估量的重大历史作用。

① 《论语·子罕》。

《周易》这部“最正确、最有体系、洵炎黄胄裔所堪自诩之宝典”^①，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以来一直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外无数往圣时贤都对它怀有一种宗教崇拜般的特殊感情，并不惜皓首穷经、耗尽心血，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热情都献给它。据史书记载，《易经》的注家不下千余，留下的专著竟有三千余种。如今，在人类文明新世纪的曙光喷勃欲出之时，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了一阵波澜壮阔的易学大潮，从而又为易学这一世界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处“风景这边独好”的雄伟奇观，增添了更加引人入胜的绚丽色彩。

面对这一文化奇观，我们不禁要问：《周易》为什么能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它究竟蕴含着什么宇宙大道而能显示出如此深远的影响力和惊人的普适性？为什么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看到并理解它的人都会对它怀有一种与日俱增的忘我迷恋与宗教式的虔诚崇拜？《周易》究竟为什么日益显示出它那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极富启迪性的现代意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人类文化之谜。

让我们携手走进《周易》这座灵光四射的神秘殿堂，以悠久灿烂的文明史赋予我们现代人的卓越智慧和宏阔视野，去亲自领略她那销魂夺魄的动人风采吧！

一 周易、易经、易传、易学辩证

周易、易经、易传、易学这四个概念常常被人提到，而

金景芳：《周易四种》，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且容易混淆，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对它们有所了解。

《周易》起初是形成于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书。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人们的视野日益开阔，他们就开始对《周易》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诠释，从而赋予《周易》日益丰富的思想内涵。这在春秋时期已经相当盛行。到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竞放异彩，其中出现了对《周易》进行系统阐发的《系辞》等七种作品，后人总称之为《易传》。秦始皇（公元前 259 ~ 前 210）焚书坑儒，《周易》、《易传》等书因被当作卜筮之书而幸免于难，并继续流传。至汉武帝（公元前 156 ~ 前 87）“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将《周易》与《诗》、《书》、《礼》、《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并立于学官，都尊称为“经”，以示其为千古不变之常道，世人必遵之天理。《易经》被奉为五经之首。西汉易学家费直为便于人们学习《易经》，遂把《易传》与《易经》合编一起，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广为流传，形成后来的通行本《周易》。1973 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与通行本《周易》很不相同，说明《周易》有不同传本。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传本是通行本《周易》，我们也将以通行本《周易》为主展开讨论。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对周易、易经、易传、易学作如下界定：

周易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周易》是指形成于西周初期的一部占筮之书，由《乾》、《坤》、《屯》、《蒙》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题、爻辞构成。广义《周易》则包括狭义《周易》和《易传》。

易经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易经》即狭义《周易》。广义《易经》即广义《周易》。

易传还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易传》是指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对狭义《周易》的经典诠释，共有七种十篇，即《系辞》上下、《彖》上下、《象》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汉人又称之为《十翼》，取意为十篇诠释狭义《周易》之作犹如《周易》的十个羽翼一样，助其在人类思想的天空中展翅高翔。广义《易传》则指包括狭义《易传》在内的阐发狭义《周易》的一切作品，其中有的汉初以后易学家的易学作品也称《易传》，如西汉易学家京房（字君明，公元前 77~前 37）^①作的《易传》，东汉易学家荀爽（约 129~192）作的《易传》，北宋哲学大师程颐（1033~1107）作的《易传》等等。

易学是指研究广义《周易》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学问的一门学科。

帛书《周易》是迄今发现的与通行本《周易》大不相同的另一个《周易》传本。它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帛书《周易》古经由《键》、《妇》、《掾》、《礼》等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题、爻辞构成；另一部分是帛书《易传》，共六篇，即《系辞》、《易之义》、《二三子问》、《要》、《繆和》、《昭力》^②。帛书《周易》对研究通行本《周易》有重大参考价值。

二 周易的作者、时代及其性质

为便于论述 我们先作一约定 此后出现的“《周易》”指通

① 西汉还有一位易学家也叫京房，是杨何的弟子、梁丘贺的老师。京君明则是焦延寿的弟子。本书中的“京房”指京君明。

② 后三篇标题原有，前三篇标题为现代学者所命。

行本《周易》“；《易经》指狭义《易经》即《周易》古经“；《易传》指狭义《易传》即《十翼》“；帛书《易经》指帛书《周易》古经“；帛书《易传》指帛书《易传》六篇。

关于《周易》的作者与创作时代 传统的说法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581~645）注曰：“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就是说，伏羲氏（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始画八卦，周文王（西周奠基者，儒家推崇的圣君）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辞，孔子（公元前 551 ~ 前 479）作《易传》以倡明《易经》。这种观点在汉代广为学者所接受。至晚成书于西汉末年的《易纬·乾凿度》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东汉马融（79- 166）又提出周公（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周文王第四子，儒家推崇的圣人）制作爻辞的观点，遂有南宋大哲学家朱熹（1130~1200）的“人更四圣”说。

北宋欧阳修（1007~1072）作《易童子问》，开始对上述传说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易传》中的《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不是一人所作。此后，疑古学风渐起。至清代，崔述的《考信录》、姚际恒的《易传通注》、康有为（1858-1927）的《新学伪经考》等均认为《易传》不是孔子之作。

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间，《周易》的作者和时代问题成为学术热点，主要倾向是否定上述传统说法。关于《易经》，顾颉刚（1893~1980）、余永梁等人认为非伏羲、文王之作，而为西周初期作品；李镜池等人认为编定于西周晚期，非一人之作；郭沫若（1892~1978）认为作于春秋以后，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关于《易传》，郭沫若推测《易传》的大部分是楚国的荀子（约公元前 313 ~ 前

238) 的门徒们作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31 年)后;钱玄同认为汉初田何传《易》时只有《易经》和《彖》、《象》、《文言》、《系辞》西汉中叶后加入汉人伪作的《说卦》、《序卦》、《杂卦》;李镜池认为《彖》、《象》作于秦汉间,《系辞》、《文言》作于汉昭、宣间,《说卦》、《序卦》、《杂卦》作于昭、宣后。上述观点有的虽有可取之处,但无疑古过勇之嫌。此后,关于《周易》的作者和时代问题又有多人作过探讨,但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其中较为流行的看法是:《易经》作于西周初年,《易传》作于春秋战国期间,均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历经多人多时陆续编纂而成的作品。

《周礼·春官·宗伯》曰:

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东汉经学家郑玄(127-200)注引杜子春云:

《连山》,宓戏。《归藏》,黄帝。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574~648)的《周易正义·序》引郑玄《易赞及易论》云:

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

《玉海》引《山海经》云:

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

根据这些文献记载，结合 1980 年左右张政烺等人对商周甲骨文中的“数字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推断：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创成当在西周以前非常远古的时代；西周以前即有与《易经》相似的典籍《连山》、《归藏》；西周以前占筮活动即已盛行，并留下大量文献记载；殷周之际文王、周公等人顺应时代要求，根据历史文献重新制作了一部系统化的典籍，即《易经》，这大约是在公元前 11 世纪。

关于《易传》，我们可以推测：《易经》形成后，人们在长期的应用实践过程中不断赋予《易经》以新的内涵，逐渐学会以《易经》来指导社会人生，而不是把它仅仅当作一部单纯的占筮之书；尤其到春秋末期，孔子等人对《易经》及前人对《易经》的阐发作了整理、研究，并对其作出自己的解释，传之于弟子；后主要由孔门弟子在战国时期完成了对《易经》解释的系统整理和创作，即为《易传》。

总之，《周易》的形成经历了远古时代至春秋战国的漫长历程，是“人更多手，世历多代”的集体作品。

关于《周易》的性质也有不同观点有人说《周易》是占筮之书。有人说是哲学著作，有人说是历史文献，有人说是政治百科。有人说是道德规范，有人说是人生指南。……我们说这些观点看似相互矛盾，实则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周易》的内涵、性质。

要分析《周易》的性质，必须先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要对《易经》和《易传》分别加以考察。

《易经》最初起源于占筮而又基本应用于占筮，是一部

系统的正宗占筮之书。《周礼》所说的“太卜掌三《易》之法”，《左传》和《国语》所记载的诸多占筮史实，孔子说的“不占而已矣”^①，及荀子说的“善为《易》者不占”^②等文献从正反两方面都充分说明《易经》是占筮之书。南宋朱熹指出：“《易》本为卜筮而作。”^③此论至为精当。

现在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个“卜筮”。西周时期及西周以前的“卜筮”是否就是孔子、荀子眼中的“卜筮”，是否就是我们所见的地摊算卦之类？《周礼》的“太卜”是否就是《左传》、《国语》中的那些为人占筮的人，是否就是我们现在遍地的“半仙”？显然不是。

《周礼·春官·宗伯》曰：“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筮”即占筮，指用《易传·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一类的操作方法揲蓍相卦，再以《易经》推断人事吉凶。“卜”即龟卜，指用龟骨或兽骨钻孔火烤后出现的兆纹判定人事吉凶。“卜”的历史要比“筮”悠久，在古人心目中“卜”也比“筮”神圣灵验。故《左传》僖公四年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可见，在那个文化垄断的文明初期，卜筮是一种用来决定国家大事的重要政治形式，是一种由极少数人（太卜等）操纵的极为高级至为神圣的文化行为，是一种古人赖以沟通天人、指导人事的重要方式，是统治阶级用以教化民众、“神道设教”^④、“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⑤，从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另外，《易经》是中华古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

① 《论语·子路》

② 《荀子·大略》

③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66。

④ 《易传·象·观》。

⑤ 《易传·系辞下》。

的对宇宙人生丰富体验的历史结晶，因而可以用来指导人事，启迪人生；是一个由复杂的象数符号系统和古典的语言符号系统共同构成的理论体系，因而可以用来锻炼思维，益人神智。

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易经》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卜筮之书。因为《易经》在用于卜筮的同时就已经由潜在到明显，由小到大地发挥着沟通天人、指导人事、锻炼思维、道德教化、启迪人生、益人神智的巨大作用，而且它的这些“额外”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主体性的增强会日益突显和增大，加之《易传》从哲学的高度给予《易经》这些作用的全面系统的极力弘扬，汉武帝将它置于“五经之首”而大力推广，遂使《易经》对中国文化各个层面的影响日益加剧，《易经》本身也就随之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经典，成为中国传统的百科全书，成为哲学名著，成为思维工具书，成为管理大经，成为历史文献，成为道德规范，成为人生指南。……

总之，《易经》是“宇宙代数学”（冯友兰语），是“神秘的殿堂”（郭沫若语），是“我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梁漱溟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高典籍”（张岱年语），每个人都能从《易经》中获得无穷的财富和永恒的启迪，每件事都能从《易经》中得到有益的提示和智慧的指导。

关于《易传》的性质，则没有太大分歧。一般都认为《易传》是一组有相当深度的哲学作品。不过《易传》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一部独立的哲学作品，而是以阐发《易经》的丰富内涵为宗旨的一组由许多人在很长时期中完成的哲学作品。《易传》中有许多思想内容是与《易经》直接相关或从中直接引申的，如揲蓍求卦的筮法，发挥卦爻辞的意蕴，阴阳对待，以及变易日新的朴素辩证思想，以乾坤为本的宇宙

论学说 以及有关政治、道德、人生等诸多方面的许多主张。

当然,《易传》中也有些思想观点是具有创造性的独特见解,如太极生两仪的宇宙论学说,“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①的主体性智慧,“顺乎天而应乎人”^②、“与时偕行”^③、“动静不失其时”^④的行为准则,“一阴一阳之谓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⑤的辩证思想,“安而不忘危”^⑥的忧患意识,谨慎戒惧、敬畏无妄的敬慎态度,“各正性命,保合太和”^⑦的价值理想,“刚健中正”^⑧、“含弘光大”^⑨的道德准则,“乐天知命”^⑩、“顺天休命”^⑪的人生哲学,“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⑫的理想人格,……正是这些深邃的思想,独到的领悟,才使《易传》成为一部日益受人推崇的哲学著作。

关于《易传》的学派性质,传统上及现代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儒家经典。因为:从历史上来看,《易传》与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儒家后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传统上一直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现代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它是儒家人物之作,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也是以儒家经典的名义发生影响的,并长期雄居儒经之首;从思想史的高度来看,《易传》发扬光大了孔子的人道思想,并吸收了道家和阴阳家的天道观,以太极生两仪的宇宙论和“一阴一阳之谓道”^⑬的形上学为儒家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成为整个

① 《易传·象·泰》。

② 《易传·象·兑》。

③④⑤ 《易传·文言·乾》。

⑥ 《易传·象·艮》。

⑦⑧⑨ 《易传·系辞上》。

⑩ 《易传·系辞下》。

⑪ 《易传·象·乾》。

⑫ 《易传·象·坤》。

⑬ 《易传·象·大有》。

儒家最基本和最高的哲学典籍，堪称代表儒家哲学之最高巅峰成就；从思想内容来看，《易传》的核心内容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主体性智慧，“立人之道曰仁与义”¹的道德准则，“刚健中正”、“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世界观，贵阳贱阴、扬刚抑柔、尚动少静、主进非退的鲜明思想倾向，……这些显然都是儒家典型性格的具体表现，而与“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²，“绝仁弃义”、“柔弱胜刚强”³、“清静为天下正”⁴等崇尚柔弱无为、清静退让的道家思想品格大相径庭，与讲“天志”、“明鬼”的墨家，主张以严刑峻法统治人民的法家，讲天人感应并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阴阳家，讲逻辑、诡辩以至于提出“白马非马”的名家，及讲以农为本的农家等也都迥然相异。近年来，陈鼓应等学者对《易传》为儒家之作的传统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易传》的哲学思想，是属于道家，而非儒家。”^⑥这种说法极为新颖独特，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总之，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我们可作如下结论：《易经》起初是一部占筮之书，但由于占筮在文化垄断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遂使《易经》逐渐演变为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经典和百科全书；《易传》是以阐发《易经》深蕴之义理为宗旨的一组由许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完成的特殊哲学作品，它非儒非道，亦儒亦道，包含着一种融汇儒道各家思想精华的新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

1 《易传·说卦》。

2 《老子》264章。

3 《老子》19章。

④ 《老子》36章。

⑤ 《老子》45章。

⑥ 陈鼓应：《易传与道家思想》序，三联书店，1996。

我们可以说，《周易》是一部以占筮为源头活水和外在形式的特殊文化典籍和哲学巨著。

三 易学源流及学派

自从卜筮起源、《易经》形成，易学发展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易学学派林立，著作浩繁，各具风采，仪态万方。一般来说，易学主要分为象数和义理两大学派：象数学派主要从卦爻象、八卦所象征的物象和阴阳奇偶之数的角度研究易学，着力探索易学象数符号系统的本质、机制、应用等问题；义理学派主要从卦名的意义和德性的角度，比较抽象思辩地研究易学，着重阐发易学符号系统的内在意蕴、深刻哲理。

易学史可分为先秦、汉易、晋唐、宋易、清代、近现代六大阶段。

先秦时期，象数学派与义理学派已各具雏形：《左传》、《国语》中的多数筮巫属象数学派，《易传》的多数作者属义理学派。

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 136 年）置五经博士，倡明经学，尊《易经》为五经之首，使易学大盛。据文献记载，汉代易学皆本于田何田何传《易》于周王孙、丁宽、服生，后又传于杨何丁宽传于田王孙，田又传于施仇、孟喜、梁丘贺。孟喜传于焦贛，焦又影响京房。京房易学有很大创新，后发展为占术。施、孟、梁丘、京四家皆立于学官，是为西汉官方易学，属今文经学，多为象数学派代表。尤以孟、京的卦气说影响最大。所谓卦气说，就是以《周易》卦象解释一年气候、自然现象的变化的易学理论，即以六十四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而形成的

一个自然哲学体系。西汉民间易学以费直为代表，费传于王横，高相传于子康、毋将永，属古文经学、义理学派。

西汉末年，由象数学派的神秘主义倾向发展出：纬之学，遂有《易纬》产生 将象数易学神学化。扬雄（公元前 53 ~ 公元 18）不满于孟喜、京房及《易纬》对《周易》神秘化的阐释 另辟蹊径 仿《周易》而作《太玄》 对西汉易学作了一次总结 为卦气说等象数易学提供了哲学依据。

到东汉，范升治孟氏易，传于杨政。而陈元、郑众等皆治费氏易。后马融又传于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作《易传》，都属费氏易传统。从此，费氏易大兴而京氏易渐衰。然治费氏易者也受到京氏易及《易纬》的影响。曹魏时期的王肃主费氏易而斥京氏易，他注解《易经》重义理，言简明，成为王弼易学之先驱。同时代的虞翻（164 ~ 233）在京房、荀爽的基础上提出许多解易新体例，将卦气说引向卦变说，是为汉代象数易学又一高峰。

另外，汉代易学除上述儒家系统外，还有道家黄老系统，西汉的刘安、严君平，东汉的魏伯阳为其代表，前两位为义理学派，后者为象数学派。魏氏的《周易参同契》提出月体纳甲说，将卦气说与道教的炼丹术相结合，以《周易》原理解说炼丹的程序，成为道教易学的开山之作，号称“万古丹经王”。

魏晋至隋唐是易学主体由象数转向义理的大变革时期。魏晋玄学创始人王弼（226 ~ 249）首开先河，抛弃汉代象数易学，继承费直、王肃易学，合参老庄而作《周易注》，义理易学为之大畅。晋人韩康伯（332 ~ 380）为王弼未注的《易传》之《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作注 从义理的高度进一步发展了王弼易学，遂使王弼易学独占古今，汉代易学随之日益衰微。王弼易学有严重的玄学化倾

向，使《周易》与《老子》、《庄子》并列为“三玄”。这时，还有阮籍、荀粲、萧衍等人宣扬玄学派易学。同时，荀融、管辂、干宝等又认同汉易传统，反对玄学派易学。两派互相攻驳，各有主张。旧称郑（玄）王（弼）之争。南北朝时郑王之争虽然仍在继续，北方尊郑易，江南崇王学，但已同时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为唐代易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着隋唐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唐代出现了两部融汇前人易学成果的名著，即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和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前者采王韩《周易注》，并在兼容其他各派易学成果的基础上对它作了进一步解释，成为唐代官方易学。后者则推崇郑学，主要是汇集汉易系统如郑玄、虞翻、荀爽、干宝等三十余家的《周易》注释，对王韩易学也有收录。此外，佛道学者也有人援引易学解说其教义，有的还创出一套世界生成图式，作为其理论基石，如《道藏·洞玄部》中的《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以太极为天地之大本，属道教易学。

到北宋，易学又进入新的鼎盛阶段，史称宋易，并一直延续到清朝初年。宋易是宋学的组成部分。宋学是推崇儒家、融汇佛道的宋明理学家对儒家经典不重训诂而主阐发义理的新学派，与重训诂、考据的汉学相区别。北宋易学中的理学派有胡瑗、程颐，程作《伊川易传》；象学派有陈抟、种放、刘牧、李之才、周敦颐（1017-1073），周则兼讲义理，作《太极图说》，论述宇宙生成过程，为儒家人伦学说提供了世界观基础；数学派有邵雍（1011~1077），创先天学；气学派有张载（1020-1077），作《横渠易说》、《正蒙》。南宋时，程、张、邵三家易学广为流传，而以程氏易为主导。象数易学也是通过程朱学派而得以发展的。如程颐